

网络舆情爆发时的社会情绪测量及其结构分析

——以李某某案为例

廖卫民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网络舆情往往借助于社会情绪长期蓄积的能量而集中爆发,其爆发状态也成为观察一段时期社会情绪的典型表征,舆情爆发时所呈现的文本数据为测量社会情绪提供了关键材料。研究选取李某某案作为典型案例,对其网络舆情引爆的关键性微博信息及相关评论文本中所蕴含的社会情绪进行样本测量和内容分析,发现网络舆情对社会情绪的呈现有着精细结构、复杂层次和连续纹理,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情绪本身具有的感染性和网络群体具有的内在聚合性。

关键词:网络舆情;社会情绪;情绪测量;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6) 02-0144-07

引用页码: 040301

近年来,各种网络突发事件或网络舆情常常引发相关的社会议题,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触发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复杂心态和强烈情绪。为了探究网络舆情爆发所突显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内在机制,本文选取了最近几年中曾经广为关注的李某某案作为典型案例,对其网络舆情引爆的关键性微博信息及若干相关文本中所蕴含的社会情绪进行实证性的样本测量,并试图从理论上探求其内在的结构关系,从而希望能在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情绪的有序调控与生态传播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理论框架:社会情绪的理论建构和测量方法

(一)社会情绪的简要理论建构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情绪(更广泛地是对社会心态)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但也有诸如政治学、传播学、公共管理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进行的交叉研究。近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文献梳理和研究综述,对其基本理

论问题和测量方法^[1]、学科范式的发展源流^[2]和更为具体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3]进行了文献梳理,对于本文论题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社会情绪”其实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又往往密不可分。对“社会心态”的概念,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4]在这一界定中,“社会情绪”实际成为“社会心态”的一部分。王俊秀则认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5]而“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的体验”^[6]。

其次,“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具有各自的内在结构,两者在多个环节形成互动与演进发展的过程。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因此,社会情绪也同样包含个体

收稿日期:2015-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XW026、15BXW055);浙江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FX2014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ZH084)

作者简介: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网络传播、新媒体舆论生态及多学科协同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情绪、集体情绪和更为宏观的社会成员共有的情绪。社会情绪的构成以个体层面的核心情感、初级情绪和次级情绪为基础,同时包括社会层面的情感氛围。社会需要、期望和社会认知共同影响着社会情绪。”^[6]在分析较为复杂的社会情绪时,其实是需要借助对人的基本情绪的分析,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其研究当中就借助了诸如 Plutchik 的基本情绪模型。这一模型包括了8种基本情绪:接受、惊奇、恐惧、伤感、厌恶、期待、愤怒和愉悦,这8种基本情绪可以混合出更为复杂的次级情绪。^[6]

第三,社会情绪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具有向行为转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在王俊秀的研究看来,“社会情绪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元素,它以情感能量来体现。由于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情感能量成为社会运行的动力。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影响着社会运行,积极情感能量和消极情感能量分别导致社会团结和社会疏离。”^[6]由此可见,社会情绪具有一种潜在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情感社会运动的动力运行机制。例如,有学者在研究群体性事件时认为社会心态经过积累与沉淀转化为社会情绪,其消极的表现为释放负能量,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7]

(二)社会情绪测量方法的梳理

在上述理论架构下,对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测量,则基本是来自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方 法。比较典型的方法有王俊秀设立的非常系统的两极指标体系,社会心态在第一层级分为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对于社会情绪之下的二级指标则设有:“社会焦虑、社会冷漠、社会愤恨、社会痛苦、社会愉悦、社会浮躁、社会贪欲”。^[6]此外,对于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测量方法中有诸如抽样调查、访谈法、文献资料分析、心理测量等,还有一些学者采用社会表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如通过委婉语、流行语的使用来分析社会心态或其他社会情感指标,^[1]笔者曾经借助了语言学语料库的方法测量主观幸福感^[8],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情绪或社会情感的测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通过非常便利获取海量的网络信息进行社会情绪测量,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建立情绪词库,通过情绪分析程序(主要是对自然语言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机器学习)对网络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测算互联网情绪指标、幸福感指数、信心指数等。有学者运用此项方法,构建了共有818个词的微博客基本情绪

词库,分析160多万用户,对微博客中五种基本社会情绪(快乐、悲伤、厌恶、恐惧、愤怒)进行了测量,并验证了其有效性。^[9]但是,这一手段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机器学习和程序分析可能会误读或不能识别细微的语词差异,无法感受细腻的人类情绪;对于单个的网络舆情或网络突发事件而言,容易淹没在海量信息里面,无法针对性地呈现相关群体的社会情绪反应和舆论情绪表达。

(三)本文社会情绪测量的研究设计

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探究在一个网络舆情突发之时,网民群体对其的社会情绪反应究竟呈现了什么特征,对于网络舆论生态有何内在影响。因此,实际需要的分析对象并不需要宽泛无边的大数据,而是要能呈现规律特征的精准的典型的小数据样本。对于这样的小数据样本,能够用人工阅读的方式直接感知网民的情绪,同时也能借助数据统计手段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完成对既定目标的社会情绪测量和内容分析。在社会情绪测量中,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并在面临不同的阶段和问题下分别加以采用。首先,选取典型案例,借助可视化的传播路径分析,集中呈现网络舆情爆发后的社会“围观”心态的图景;然后,精准确定样本,并运用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来探求网络集群表达中社会情绪的典型表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样本进行数据测量和统计分析;最后再进行讨论和解释。

二、舆情分析: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及其寓意探究

(一)李某某案的研究意义

李某某案事发于一件案情本不复杂的未成年案件,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上,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必要保护,隐私权应受到保护和尊重,此案本不应该在公共场域进行过度的传播。然而,从事件披露到最后判决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引起巨大的舆论关注。据人民网权威发布的《2013 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该案在20个年度网络热点舆论事件中位列第二。李某某案发生在2013年,但在此案之前就曾暴露出李某某滋事打人被收容教养(2011年)的事件,已经造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后案撩起前案,且更胜前案,公众对此案关注的时间跨度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年,期间环节丛生、疑窦迭起、热议不绝,这是网络舆情案例中少有的。该案的后续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李某某”“星二代”“未成年人犯罪”“家教”等关键词,都能发

现大量的文献。由于该案的标杆性意义,在各种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该案往往被当成典型案例,李某某案的社会关注度明显超过了同类的一般案例。

(二)李某某案爆料微博内容介绍

李某某案最早被公开披露,根据各方面的报道分析,都指向了2013年2月22日11时04分发出的一条微博。这条微博的主人当时实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王丰-SCMP”。尽管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多,这条微博至今依然还留存在网上,内容是:

北京来电: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http://t.cn/zYC30EE>^①)。

笔者登录新浪微博,并通过北京大学 PKUVIS 微博可视分析工具作图,刻画出这条微博自发布后的传播路径及影响人群。这条微博总共获得了转发4875次(包括间接转发的数目),获得了评论2105条。

(三)李某某案爆料微博传播路径的整体状况与寓意分析

1. 爆料微博传播路径的整体概貌

从其传播路径图的宏观整体印象看,这条微博所呈现的基本是一种全面引爆的传播格局,在传播期间夹杂着中小型的连续引爆。从时间看,整条微博传播的时间段非常集中,完全是爆发式的。在这幅图中左下角的时间与微博转发评论量的关系曲线,呈现的完全是一座小山头的形貌(如图1所示),坐落在最左侧,这意味着在舆情发生的初期,该微博就完成了绝大部分的传播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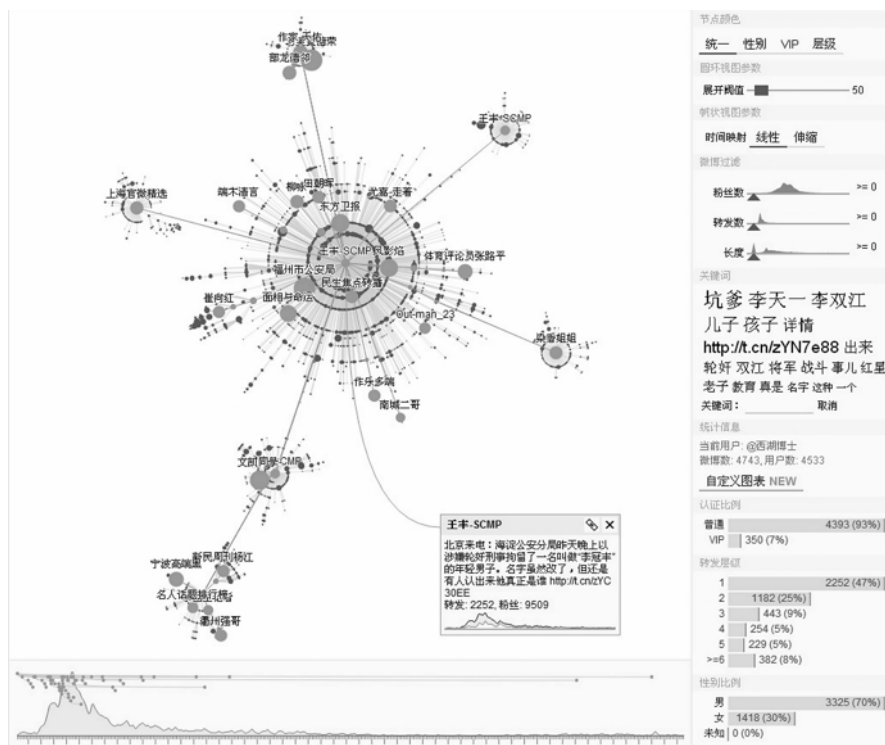


图1 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及详细内容呈现

2. 传播路径帆形图寓意分析

这条微博传播路径的帆形图如图2所示。帆形图在可视化图中较好地结合了时间和传播路径的两种视角,并加以复合性呈现。在此微博发出后的很短时间内,形成了较大面积的转发,包括博主自身的转发。据统计,这条微博的一级转发数目达到了2252次,占据了大约47%的转发比例;二次转发1182次,占据了大约25%;三次转发443次,占据了大约9%;四次转发254次,占据了大约5%;五次转

发229次,占据了大约5%;六次以上转发382次,占据了大约8%。

在这张帆形图中的中间勾勒出的风帆底部边缘较为陡峭,上半面则较为飘逸,整个边缘线上面点缀着非常多的中等大小的节点,这表明第一轮转发的节点中有较多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节点,这些节点进行了再次转发和传播,它们引发的连锁式的放大传播效应并不明显,这表现在横向飘散的丝带不多见。在

① 微博地址:<http://weibo.com/2683806131/zkkFha5m0>。

顶部较为飘逸流散,则表示到了传播的后期(即当天之后和第二天),基本大家都从各种媒体知晓此事,再

对这条微博进行转发评论的人员则明显衰微,但是,也有个别较大形体的节点在较晚时期进行了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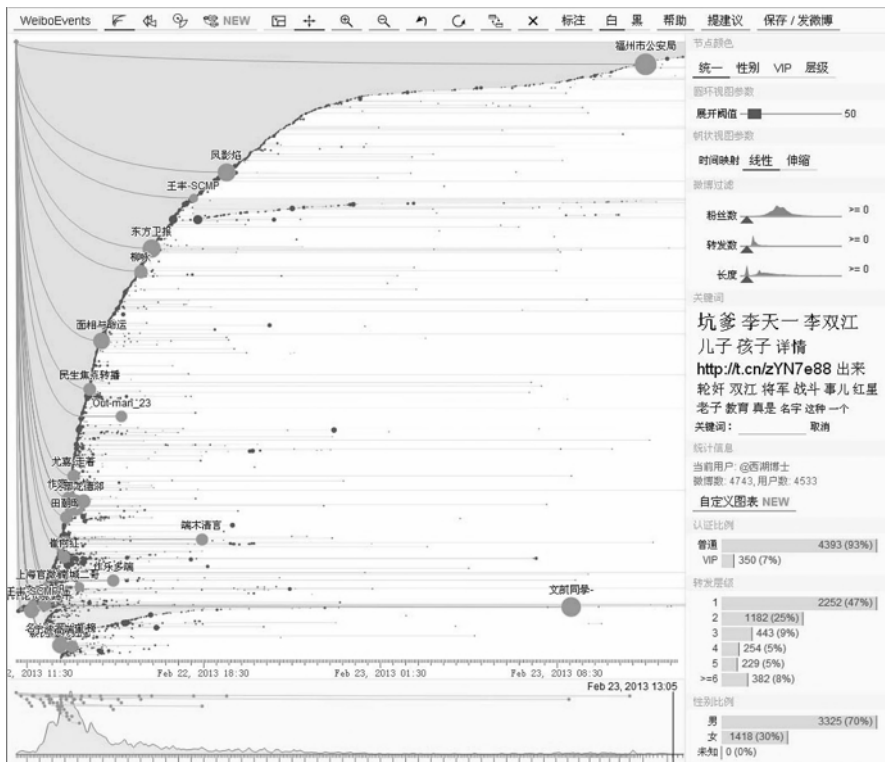


图2 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帆形图

纵观以上不同可视化视角下的传播路径示意图,充分表明这一爆料信息的传播非常迅速,反响及时、集中且强烈,但持续时间有限。这条微博爆料信息,可以说在一天之内就达成了大面积传播的效果。李某某案爆料微博的传播路径帆形图,在某种程度上寓意该案引发的社会议题向着网络舆论之海满帆而行,而推动其前行的恰恰是某种弥漫于社会之中的一种强势情绪之风。

三、情绪测量:李某某案引爆过程中蕴含的社会情绪图像

面对网友王丰—SCMP的爆料微博,网民的直接反应如何呢?这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最为直接鲜活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社会表征。为此,笔者将借助相关研究方法,对该微博后面的评论转发信息进行传播学层面的内容分析,同时,还借助文本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一)社会情绪测量的样本确定及其概况

1. 总体与样本的基本数据

该微博后面的评论转发信息总共有106个页面,笔者将这些内容全部下载后,进行了初步统计,剔除若干无效信息后,总共获得有效数据2039条。

时间从2013年2月22日11:05分开始一直到3月28日5:40分为止,总共的文字量达到了87605字,平均每条信息的长度约为43个字,信息长度的标准差为36。

为了研究方便,同时也能最直接感受到社会情绪的鲜活气息,确定研究前面500条的信息,进行内容分析编码,这个小样本总共有20841个字,每条信息平均字长为41.7个字,信息长度的标准差为40.3。这部分的信息发布的时间为从2013年2月22日11:05分至13:25分为止。

2. 样本中的信息传播内容及状态分析

首先,对这个小样本总共500条信息进行研究分析。笔者将其评论表达所呈现出的内容进行初步分析,表面上看,这些芜杂的信息一下子难以归类,但是,根据其传播功能,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进行信息传递作用的,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感情色彩和情绪状态;另一类则是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同时也呈现了某种情绪色彩,但是,其主要的作用还是在表达相对理性的思考内容,具有更为重要的信息功能,这两大类具有较为明显的信息传播功能,能够让人们获取信息、了解情况、判断性质、思考意见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类内容,主要是进行情绪表达,用寥寥数

语表达了非常明显的情绪色彩,在其情绪传递的过程中,也往往表达了一定的态度倾向性或意见主张。

第一大类主要是一些无情绪色彩的信息,主要包括:转发、求助、强调、指向、回复等内容,还有空信息,或者仅用一些符号表示。这类信息总计有 133 条,占据了 26.6%。第二大类信息则包含一定情绪的信息传递,主要类别有疑问、求证、回复、定性等内容,还有一些补充信息,或者对事情进行性质判断和问题解释分析等。这类信息总计有 125 条,占据了 25%。以上两大类相加,总计有 258 条,大约占了 51.6%。第三大类,经过统计大约有 242 条评论信息,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色彩,这是本研究最为核心的小数据。

(二)对测量样本的初步整理及相关的系统分析

在上面选定进行社会情绪测量样本的 242 条评论信息中,经过仔细的阅读后,发现相关的情绪内容主要类别有:哀其不争、安慰、暗讽、报应、悲哀、不信、得意、断言、反讽、反讽调侃、反问、反问起哄、愤怒、讽刺、感慨、感慨反讽、感慨起哄、感愧、感愧遗憾、感叹、感叹比较、感叹警示、感叹责骂、后悔、讥讽、建议、教育、惊奇、警示、静观其变、可怜、可惜、可叹、可恨、理性、怜惜、骂人、怒骂、批评、评价、平静、起哄、气愤、气愤调侃、气愤严惩、叹息、调侃、调侃反讽、同情、推理、围观、无奈、无语、嬉笑、笑话、笑笑而过、严正、厌恶反思、遗憾、疑问、预测、责怪、责怪感叹、责骂、责骂感叹、震惊、指责感愧、指正等等。有的语言中有一些复合型的情绪,加以简化,选择主要的两个类型加以复合,如“厌恶反思”有两种情绪结合而成。如此一共有 66 种。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李某某案案发之后,人们在听闻微博爆料后社会情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研究的两名编码员对这些评论信息进行数据编码,即给不同的评论转发信息标上情绪内容的类

别关键词,并将类别相同的进行归类统计,编码员独立编码后再进行比对。同时,为了便于展示这些类别在情绪强度上的差异,编码员还对其情绪分值进行了评估,这个方式参照了情绪词库的建立方法,即对每个情绪类别词组给出一个分值,两名编码员给出的分值如果不同,则取其平均值。“无语”“平静”与“围观”类别被确立为 0 分,其他的类别依次打分,正向情绪为正值,负向情绪为负值,编码员认为其情绪类别的强度每深一层则加一分,直到将所有类别编码完成,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从-7 到+6 的一段取值范围。Dodds 和 Danforth 在“从大规模的书写表达中测量幸福”研究方案中曾对于 ANEW (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 词库表的幸福分值分为三个维度:好与坏、积极与消极、强与弱,每个维度上赋予 1 到 9 之间的分值,其所赋的分值是人工给定的,其主要作用可以区分不同词汇的情绪程度。^[10] 同样,参照其方法,本研究对网民评论情绪类别的评估取值其作用根本在于分级区隔,而非精确计算,本研究中得出的从-7 到+6 范围内的取值并不是线性的、连续的数值。

在取得编码数据之后,就能勾画出一张基于小数据样本的社会情绪倾向统计分布示意图(如图 3 所示)。从这一图谱上能看到的,是整个情绪状态的一种离散的多样化的分布状态,都统一绘制集中在一张图形当中,横轴是情绪类别,纵轴浅色起伏较大的为评论条数,深色叠加部分为情绪的正负分值。由于情绪取值有正负之分,在该图谱中如果深色叠加部分向下,则意味着此种情绪具有某种负能量,如果深色叠加部分向上,则意味着此种情绪具有某种正能量,它们所呈现的宽幅则为深色阴影之长。从这幅图大致可以看出该爆料微博评论样本所呈现的社会情绪的分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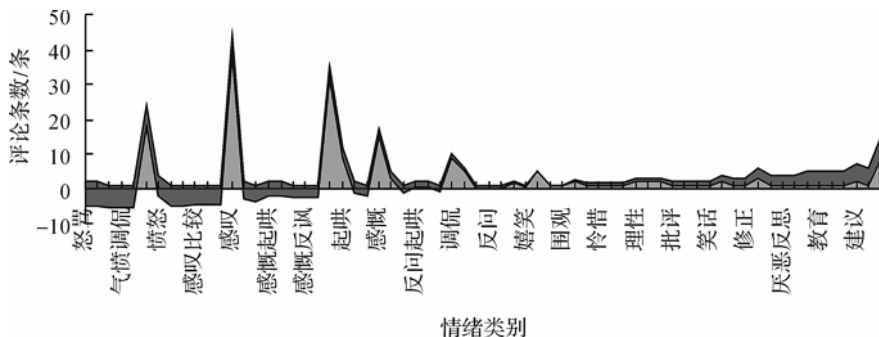


图3 242条微博评论中情绪倾向的分布示意

注:横轴是情绪类别,纵轴浅色为评论的条数,深色叠加部分为情绪的正负分值。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实际上有些关键词虽然相同,即其内在的情绪类别是大致一致的,但是其情绪所指向的对象或许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感叹,有的是感叹当事人,有的是感叹其父母,有的是感叹社会,有的是感叹人生;同样是愤怒,愤怒的原因也有着诸多的差异。由于网民意见和表达实在是太多了,五花八门,生动有趣,有的确实难以归类。因此,这一编码的方法只对情绪类型加以区别,而不再细分其缘由、产生的客体对象和主体因素等差别。因此,笔者把同类情绪加以归并,并不意味着这些情绪本身完全是同质的,其内部也有多种细微的差别。

第二,对于情绪强度,编码员根据情绪色彩是否具有正负向的感染能量和理性成分,对其中的类别做了一种定量的给分,主要是基于编码者的理性判断。两个编码员之间可进行互相校正并进行比照。

第三,有些类型的情绪较为近似,则加以归并,而有的评论掺杂了多种情绪在里面,有较为复杂的综合反应,是一种心理混合状态,如五味杂陈一般,则抽取其中主要的两种情绪类型,加以合并,从而取其中间的平均数值加以定分。

第四,从正向的情绪状态来看,总体上看数量较少,因而,整个情绪指标呈现的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指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这条微博爆料后的舆情发酵过程中,参与评论的部分网民的情绪表现较为激烈,且呈现出明显的情绪类型集中的统计分布状态。

四、结构分析:李某某案揭示当下社会情绪的内在结构特征

(一)测量样本中呈现的典型社会情绪的十大类别

在上面选定的这个小样本中,较为集中的情绪类型依序排列主要有感叹、反讽、骂人、感慨、警示、起哄等,为此,笔者列举出社会情绪测量样本242条评论中的十大情绪类型分布数据表(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情绪测量样本242条评论中的十大情绪类型分布数据表

排序	情绪类别	评论数量/条	情绪分值
1	感叹	44	-5
2	反讽	35	-3
3	骂人	24	-6
4	感慨	17	-2
5	起哄	12	-3
6	调侃	10	-1
7	警示	8	6
8	讽刺	6	-1
9	讥讽	5	-2
10	无语	5	0
总计(占比)		166(68.6%)	

从情绪类别的人数数量看,其前4名排序为:感叹、反讽、骂人、感慨,其总占比达到49.6%,接近一半。这表明样本人群中的社会情绪基调如此,且集中呈现如此,在社会情绪分布图谱(图3)中,其实可以一下子就看到那几个尖峰。

(二)测量样本中呈现的典型社会情绪的内在结构特征分析

基于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如果按照Entman所界定四个层面框架“性质界定”“因果解释”“道义评估”和“处置建议”^[12]和笔者增补的另一个层面的框架“情感宣泄”^[13]的视角来看,上述五大类别正好分别落在其中。第一,网民的“感叹”恰恰多是在对此案性质的界定,如“爹不跌坑,儿坑不迭”的议论;第二,网民的“反讽”则往往直指问题的因果关系及事件原委,如“李公子没有衙内的命却有衙内的病”的议论;第三,网民的“骂人”其实正是对事件的“道义评估”,如“孽子!”“孽障”等;第四,网民的“感慨”,在某种意义上看往往透露出网民对此事处置的一种建议或态度——这是普通网友多数无能为力的慨叹。当然,另外一批网友则用“警示”的情绪表达了“处置建议”,以儆效尤是其中的基本建议。第五,网民的所有这些情绪性表达都构成了一种“情感宣泄”,只是在程度上有轻有重,从网友反馈的比例可见,242在500条中的占比也有48.4%,这也足以说明宣泄性的情绪表达,在整个事件舆论表达中的重大比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和揭示了此案舆情引爆的爆炸性、突发性特征。

可见,基于以上这一小数据样本的统计分析,传播文本数据揭示了在总体上展示的社会情绪中一种普遍统计分布规律,社会情绪集中在了多个层面的框架维度上,尽管从宏观上看社会情绪纷繁复杂、变化各异且充溢着网络空间,但网络舆情中的社会情绪呈现却是有着精细的结构、复杂的层次和多变的纹理,具有一种运作自如的系统性和生机勃勃的生态性特征。

五、结语启示:当下社会情绪图谱的意义解释及相关政策建议

尽管李某某案事发至今已经有两年多,但此案相关的网络舆情爆发后所呈现的社会情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依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只要冷静地回顾一下李某某案,即可以发现,它其实只是在2013年当微博传播成为网络舆论场主流形态的基本格局下的一次网民大众狂欢。这次狂欢清晰地展示了社会情绪的丰富面貌。如果从李某某案揭示当

下社会情绪图谱的意义层面来分析,网友在社会情绪表达的“性质界定”“因果解释”“道义评估”“处置建议”和“情感宣泄”过程中,都是对此案涉及议题的社会意义的一种公共建构,这种建构其实是在既往无数事件积淀的社会情绪上的一种叠加和累积。

对于网络舆情中社会情绪图谱之所以形成相对集中又复杂多样的形态,笔者分析其主要的原因为:一是社会情绪本身具有感染性,容易产生强烈的连锁反应和协同效应,特别是类似李某某这样的过去累积的负面社会情绪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引爆,在网络传播中容易产生更大的舆论情绪反应;二是在网络空间上容易吸引同质人群的聚合,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内在聚合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社会情绪的有序调控与生态传播提出以下三点有针对性的建议:

a)正本清源,改善宏观生态,增强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绪,增强对公平正义环境的维护,对法治秩序的建设、对道德良心的宣教、对全民特别是下一代教养情操的培养。

b)对症下药,去除顽疾,消除隐患,强化对负面社会情绪的消解,特别是针对有潜在巨大危害的负面社会情绪——列出清单,用典型案例教育引导,用一些精准方案治疗特别病例,例如,对于负面的案例要犀利解剖、刮骨疗毒、去除有害影响,从而弘扬正能量。

c)优化微循环,线上线下互动,让公众能积极有效地进行社会情绪表达,调整各种的社会心态,通过组织线下互动,形成良性社会互动,畅所欲言,心情愉快。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自我良性循环、自如协调和良性发展的健康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 [1] 欧阳瑜华,刘海燕. 社会心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综述[J]. 理论探索,2014(5):47-50.
- [2] 王俊秀. 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4(1):104-124.
- [3] 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概述[J]. 心理科学进展,2011(2):217-223.
- [4] 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 社会学研究,2006(4):117-131.
- [5] 王俊秀.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J]. 社会科学战线,2013(2):167-173.
- [6] 王俊秀. 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55-63.
- [7] 孙德梅,王正沛,康伟. 群体性事件管理的一个心理学视角:基于社会心态、社会行为理论的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14(2):143-149.
- [8] 廖卫民,钱毓英. 民生新闻传播与社会幸福感评估:基于浙江省媒体语言语料库的实证分析[J]. 当代传播,2012(3):21-25.
- [9] 董颖红,陈浩,赖凯声,等. 微博客基本社会情绪的测量及效度检验[J]. 心理科学,2015(5):1141-1146.
- [10] DODDS P, DANFORTH C. Measuring the happiness of large-scale written expression: songs, blogs, and president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11(4):444-456.
- [11] 董颖红. 微博客社会情绪的测量及其与社会风险感知和风险决策的关系[D]. 天津:南开大学,2014.
- [12] ENTMAN R.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4):51-58.
- [13] LIAO W M. Framing political sex scandal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J]. China Media Research, 2010(2):67-80.

Social Emotion Measurement in the Case of Outbreak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Analysis on Its Structure-Take Case of Li for Example

LIAO Weimin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ten outbreaks intensively by means of the energy accumulated by social emotion for a long time. Its outbreak state becomes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for observing social emotion in a certain period. Text data presented in the case of outbreak of public opinion provide key material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emotion. This study selects the case of Li as a typical case, conducts sample measurement and content analysis on social emotion implied in key microblog information and relevant comment text initiated by i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finds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social emotion by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fine structure, complicated level and continuous texture. Its main reasons include the infectivity of social emotion and inner polymerizability of internet groups.

Key words: online public opinion; social emotion; measuring emotion; content analysis

(责任编辑:任中峰)